

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 收入分配研究

曲兆鹏◎著

ZHONGGUO JINGJI FAZHAN YU ZHUANXINGZHONG DE
SHOURU FENPEI YANJIU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 收入分配研究

曲兆鹏◎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收入分配研究/曲兆鹏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141-7780-0

I. ①中… II. ①曲… III. ①收入分配-研究-
中国 IV. ①F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2411 号

责任编辑: 周国强 程辛宁

责任校对: 徐领柱

责任印制: 邱 天

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收入分配研究

曲兆鹏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金融编辑中心电话: 010-88191350 发行部电话: 010-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zhouguoqiang@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1000 16 开 14 印张 230000 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7780-0 定价: 5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esp.com.cn)

ZHONGGUO JINGJI FAZHAN SU ZHILIANXINGZHONG DE
SHOURU FENPEI YANJIU

本书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新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动态演变”（10YJC790209）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我国农民工消费研究”（13CJY091）的资助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5
1.3 研究框架、概念和主要方法	10
1.4 内容安排	13
第2章 老龄化与消费不平等	17
2.1 导论	17
2.2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不平等	19
2.3 收入与消费不平等及其分解	21
2.4 可观测变量的作用	34
2.5 稳健型检验	36
2.6 结论	42
第3章 城乡消费不平等	44
3.1 导论	44
3.2 数据与统计性描述	46
3.3 Blinder - Oaxaca 分解	56
3.4 Machado - Mata 分解框架	58
3.5 稳健性检验与扩展分析	68
3.6 结论	74
3.7 技术附录：分位回归分解方法	74

第4章 全球化与城市工资不平等	76
4.1 导论	76
4.2 全球化与收入分配：理论与经验	78
4.3 全球化与中国省内收入不平等	82
4.4 计量方法与结果	89
4.5 结论	98
第5章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工资不平等	99
5.1 导论	99
5.2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实证方法	100
5.3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演变	102
5.4 结论	114
5.5 案例分析：从大学毕业生探究中国劳动力 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	115
第6章 新世纪城乡移民劳动力市场的转变	132
6.1 导论	132
6.2 新世纪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态势的重大转变	133
6.3 新世纪城乡移民劳动力市场的动态演变	140
6.4 城乡移民劳动力市场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51
第7章 人力资本、城乡移民就业与收入分配	153
7.1 教育和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	153
7.2 语言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	172
7.3 人力资本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创业	182
第8章 结语	205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20

第 1 章

绪 论

自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近四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9%，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跃居至全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份额由 1978 年的 1.8% 增长到 2015 年的 13%，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381 元增长到了 2014 年的 46731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1978 年增长 19 倍，年增长率达到了 8%。与此同时绝对贫困人口也大幅减少，这一发展速度和经济成就在现代国家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堪称“中国的奇迹”。

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急剧恶化，不均等程度大幅攀升。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演变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基尼系数从 1981 年的 0.29，上升到 1988 年的 0.38，1995 年进一步扩大到 0.45，2002 年达到 0.47（李实、史泰丽和古斯塔夫森，2008）。这一不均等水平已经位列全世界收入差距较高的国家之中。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经济和社会难题之一，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话题。

1.1 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最显著特点就是同时处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双重转型”之中（李实和赵人伟，1999）。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角度来看，中国具

有很多既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同于原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的固有特点，而且出于经济和政治因素考虑，又执行了若干特有的社会政策，如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等。这使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既有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国家的相同之处，又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转型时期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所以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收入分配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李实、史泰丽和古斯塔夫森，2008）。

因此，要想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就首先不得不考虑整个中国改革和发展大背景。我们将通过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全球化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几个方面来描述和概括中国经济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主要背景和环境。^①

首先，伴随着经济与社会迅速而深刻的转型，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经历了剧烈的人口转变过程。不仅人口的出生率大幅下降，而且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按照人口学界公认的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仍然在有效实施，同时医疗水平的进步，也使人口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我国老龄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年均增长率高达3.2%，几近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2006）。人口快速老龄化意味着“人口红利”时代的提前结束，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下降，绝对适龄劳动力数量也将不断下降。这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劳动力短缺时代的到来（蔡昉，2008）。这一重大转变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必然影响到整个收入分配的格局。在一个人口日益老龄化的社会中，收入分配问题涉及代际之间的公平，攸关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① 这一概括不可避免的遗漏了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同等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如政治集中和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张军和周黎安，2008；周黎安，2008）以及基于关系网络形成的社会结构（陆铭等，2008）等。但上述从政治和社会视角对中国经济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所能讨论的范畴。

② 根据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当一个社会中的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时，就称该社会为老龄化社会，2005年我国人口的上述比例分别为13%和9%（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计算）。

其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实行城市化偏向的发展政策,同时配以严格限制劳动流动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分隔为两个世界,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加大,成为中国近些年来最为人所关注的社会现象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1978年,城乡收入比就已经高达2.5。由于中国首先从农村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们恢复了经济自由。这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激励机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Lin, 1992)。结果城乡收入比显著地下降,从1978年的2.5下降到了1983年的1.82。然而在此之后,当改革扩大到了城市范围,城乡收入就再次上升,直到2006年达到了3.3。这一比例几乎是世界最高(李实和岳希明, 2004)。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仅绝对数量巨大,相对于农村和城市内部差异而言,城乡收入在全国收入差距中的所占的比重也是最大的(李实和赵人伟, 1999)。城乡之间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甚至比收入差距更大,粗略的将城市居民所享受到的各种补贴全部换算成收入之后计算的城乡差距,即使考虑城乡之间的价格水平差异,也达到3.1左右(李实和罗楚亮, 2007)。巨大的城乡差异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对整个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的过程。全球化成为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动机之一,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要来源。1985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仅为469.85亿美元,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6.58亿元,而到了2008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超过25616亿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加近55倍,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名义增长53倍,增长幅度巨大。尤其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增加异常迅速,外汇储备和外商直接投资额连年稳居世界和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开放不仅直接增加了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新的技术和商业、管理模式,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因此必然使个人收入的格局发生调整和变动。另外,由于中国各个地区在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的差异,以及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的不同,造成各地区融入全球化程度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由此构成了中国收入差距中重要的部分——地区差异的重要来源(陆铭等, 2008)。

最后,虽然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分割状态。改革之前的中国并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始终维持着城乡分割的典型二元结构。改革之后,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伴随着非国有部门(主要是私有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和国有部门的深化改革不断成长。非国有部门基本上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它们对雇用劳动力的数量和工资水平都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而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使得其劳动力雇用机制越来越面向市场(蔡昉和林毅夫,2003)。与此同时,伴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中国农民开始加入到现代化进程当中,大量涌入城市或加入乡村工业。中国开始形成基本的劳动力市场。但从整体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着分割的基本格局(赖德胜,1996a;蔡昉和林毅夫,2003;陆铭,2004;赵忠,2004)^①。导致这种分割格局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原有的劳动力市场体制及与其配套的一系列政策(如户籍、档案、社会保障等)(赖德胜,1996)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带有歧视性的劳动力市场规定(如准入证、用工指南)(蔡昉、都阳和王美艳,2001)所产生的影响。这些政策和规定加大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制度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1996a)。进入21世纪的中国劳动力市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如以户籍制度为代表原有劳动力市场体制)进一步被削弱,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其他更为根本的因素,如教育、养老和医疗等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和社会保障差别,以及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不同职业和性别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开始进一步显现(赵忠,2004;赵耀辉,2005)。这些新老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加大劳动力调整就业的成本,不利于企业提高效率,更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

如上所述,由于受到双重转型再加上特殊的社会政策的影响,中国居民

^① 很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赖德胜(1996a)、蔡昉和林毅夫(2003)分析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种在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二元二元分割的特殊结构。陆铭(2004)认为,转轨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主要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就业体制的二元分割。赵忠(2004)总结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分割状态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收入分配的状态和影响因素既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也不同于原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而是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况,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社会发展和转型时期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鉴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如此重要,因此很多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在这方面最为系统和跟踪时间最长的要数先后由赵人伟和李实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他们组成了国际化的研究团队,使用可以跟国际研究接轨的标准来设计调查问卷,在国家统计局的协助下,对中国城乡住户的收入、消费和家庭财产等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三次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宝贵数据,其主要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赵人伟和格里芬(1994),赵人伟、李实和李思勤(1999),李实、史泰丽和古斯塔夫森(2008)等学术著作及数十篇发表在国际国内高水平学术杂志上的论文中^①。在整个中国经济学界,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他们以及其他许多国际国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对于中国收入差距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从收入差距的大小,到变动趋势,到影响因素分析等,都有详尽的分析,在很多方面,学者们已经达成了许多共识^②。

尽管如此,鉴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宏大和复杂,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若干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在这些问题中,有的已经有学者进行了若干研究,但限于数据和研究方法,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例如,城乡差异、对外开放与工资不平等。有些问题,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则几乎还是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的空白。因此,本书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大背景,着力从老龄化与收入分配、城乡消费不平等、全球化与工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等几个方面来研

① 未包括用英文在海外出版的著作。

② 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现状,李实(2003)是一个非常全面系统的研究综述。而蔡昉(2006)更多的是从收入分配影响因素的角度对最新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究中国收入分配与劳动力市场问题。

下面就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详细的文献综述。

1.2.1 老龄化与收入分配

人口的老龄化，其根本含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趋势和过程。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时，必然会影响到诸如收入和消费等经济变量与年龄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与个人的福利状况直接相关，因此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不平等。按照 Deaton 和 Paxson (1994, 1995) 的分析，在一定合理的假设条件下，人口中总体的不平等水平可以表现为出生组组内效应和出生组组间效应，而人口结构变化必然会影响出生组组内效应。所以，要想研究老龄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就必须对总体不平等进行分解，把总体的不平等分解为人口效应、出生组组内效应和出生组组间效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研究成果。Lam (1992) 首先从人口理论出发，采用上述思想对巴西和美国的工资不平等进行了分解，并且发现老龄化对工资的不平等效应在美国和巴西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 Deaton 和 Paxson (1994) 从经典的消费理论入手，推导出了和 Lam (1992) 非常类似的分解方法，明确将总体的不平等分解为出生组组内效应（或年龄效应）、出生组组间效应和时间效应。利用这种方法，他们对美国、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消费数据分别进行了分析。而 Ohtake 和 Saito (1998) 则利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家庭调查数据，扩展了 Deaton 和 Paxson (1994) 的分解方法，对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消费不平等迅速增加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一期间接近一半的日本不平等水平的增长可以归结为人口老龄化。Cai, Chen 和 Zhou (2007) 是关于我国消费不平等的不多的文献之一。他们利用 1992 ~ 2003 年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家庭调查数据，着重研究我国城市人口中消费与不平等的关系。他们采用的方法与 Ohtake 和 Saito (1998) 一致。他们发现从 1992 ~ 2003 年，我国城市消费不平等的变化主要是出生组组内效应带来的，而人口老龄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很小。这一结果与 Deaton 和 Paxson (1994) 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的结果大相径庭。从理论看，Deaton 和 Paxson (1994) 的理论分析和估计结果显示在一个同时经历高速经济增长和人口老化的经济中，人口老龄化对不平

等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联系到我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城乡存在显著差异的现实,有必要用我国家庭消费的微观数据来检验 Deaton 和 Paxson (1994) 的理论。

1.2.2 城乡消费不平等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的非平衡性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证明,这一差异随着经济增长而往往趋于减小,最后达到城乡之间的和谐发展。而在中国的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却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

如此显著的城乡差异问题早已被学术界所关注,经济学家们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赵人伟、格里芬、朱玲和李实(1994),赵人伟、李实和卡尔·李思勤(1999)和李实、史泰丽和古斯塔夫森(2008)的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其中,Sicular, Yue, Gustafsson 和 Li (2007)使用与本书同样的数据,发现地区价格差异可以解释一部分的城乡差异,但调整价格差异之后的城乡差异仍然相当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增加。他们还发现城乡教育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高度相关。而 Knight 和 Li (1996)则进一步调查了城市和农村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城乡之间教育机会存在显著的不平等。Knight 和 Song (1999)仔细研究了城乡之间差异的许多个纬度,包括收入、教育、健康和住房。最后,Tsui (1993)、Kanbur 和 Zhang (1999)发现城乡不平等是总体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而李实和罗楚亮(2007)将城市居民所享受到的各种补贴全部换算成收入,然后又利用 Brandt 和 Holz (2004)的地区价格指数考虑了城乡之间的价格水平差异,这样计算的城乡收入差异仍然达到 3.1 左右。

然而,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农村和城市消费差异方面的研究。理论上,消费是对家庭长期福利更好的度量,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家庭的长期收入能力,而收入很容易被暂时性冲击所影响,尤其对于永久收入很难度量的中国农村来说,情况更是这样。在上述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仍然是在平均水平上研究城乡差异。但如果我们考虑整个城乡收入的分布,那么城乡差异在不同水平上可能会有不同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利用最新的分位回归分解方法来研究城市和农村在整个消费分布上的差异,以及城乡消费差异从 1988~2002 年的

动态演变。

1.2.3 全球化与工资不平等

一直以来,全球化作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全世界各地都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全球化促进了商品、人力、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扩散,从而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在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福利。然而,反对者认为全球化促使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成为扩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中国这样类似的争论也有很多。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主要都集中在全球化与地区收入差距方面,采取的研究方法也多是使用总量数据对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衡量,再与全球化指标之间进行分析,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对外开放会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例如,Kanbur 和 Zhang (2005) 发现对外贸易程度与地区间收入差异呈现正相关关系;Xing 和 Zhang (2005) 发现衡量对外开放的另一个指标——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类似的效应;而 Chen, Lu 和 Wan (2004) 利用 Shapely 值分解方法得到的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均显著为正。赵莹 (2003) 采用我国 1978 ~ 1998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证实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均会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唯一的一个例外是 Ravallion 和 Chen (2004), 他们利用比较权威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证明贸易扩大与总体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但总体的不平等不仅是由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带来的,也是由于地区内部的不平等所带来的。何璋和覃东海 (2003) 采用我国 1999 ~ 2001 年的省际截面数据证明:在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开放程度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 U 形关系,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关系。范言慧 (2003, 2009) 也发现:在 2000 ~ 2001 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密集度与各省的工资差距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即在吸收外资直接投资较少与较多的省份中,外商投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都较小,而在吸收外资规模局中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却较大。但随着时间的增加,这一关系逐渐弱化。到 2006 年,这一关系就不再明显。王少瑾 (2007) 采用 1991 ~ 2004 年省际的面板数据,发现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均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

高。但 Wei 和 Wu (2001) 利用 1988 ~ 1993 年 100 多个城市数据研究表明, 全球化会显著的减少而不是增加城乡差异。张茵和万广华 (2006) 使用省级面板数据, 针对城市贫困的研究也表明, 贸易开放与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是正相关的, 因此对外开放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

通过以上的总结我们可以发现, 大多数关于全球化对中国不平等的研究都集中在地区收入差异方面, 而对于对外开放的直接效应——工资不平等效应问题进行规范的经验研究并不多。正如我们前面在理论部分所介绍的, 全球化影响收入分配的一个主要影响渠道就是引起不同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 进而影响收入分配。此外上述研究大多采用总量指标而没有采用地区的指标。正如 Wei 和 Wu (2001) 说明的: 大量的全球化与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均采用跨国回归的方法, 由于不能够充分控制国家间在经济、法律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难以准确度量的差异性, 因此这些研究的结果很难让人信服。如果使用中国各省市的数据来研究, 就可以在这方面最大限度地保证统一性, 避免了跨国回归研究中的问题。因此, 从理论上采用跨省回归的方法对地区内部的收入差异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也是有意义的。

1.2.4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

虽然中国市场化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还是认为, 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分割的状态中 (赵忠, 2005)。从定性上判断,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与其他国家既有共同点, 又有独特性。共同点是指在很多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中, 存在的一般性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 如行业分割、职业分割和性别歧视等在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 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揭示了改革以来性别之间工资差距在不断加大, 如 Meng (1998), Gustafsson 和 Li (2000), Liu 等 (2000), Rozelle 等 (2002), Liu (2004), 王美艳 (2005), 葛玉好 (2007a, 2007b) 等; 职业分割方面, Meng 和 Zhang (2001) 的研究表明, 不同户籍的居民之间的职业分布和工资都表现出了显著差异; 行业分割方面, 陈钊、万广华和陆铭 (2008) 发现, 行业不平等是城镇收入不平等中, 仅次于地区差异的第二大因素。不同点是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有很强的制度性因素, 具体表现在由于实行户籍制度

所导致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以及由于所有制不同而带来的所有制分割。城乡分割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比较优秀的有 Zhao (1999) 和朱农(2005)等一系列关于城乡迁移的研究;Knight 和 Yueh (2004) 则分别考察了城市居民和流动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转换率;作为最重要的转轨国家,企业所有制造成的工资差别研究也有不少,如 Dong 和 Bowles (2002) 详细分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 Knight 和 Li (2005) 则研究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经营效益的好坏对职工工资分布的影响。

上述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但大多数所采取的方法都是用外生的变量,先将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进行分组,之后再进行工资方程回归,或者进行工资均值的分解。尽管上述分类是严格外生的,如户籍、性别或者经过选择性偏差调整后的行业、所有制和职业等标准,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在一个区域、行业、所有制等分组内部的工人,也不能被认为是属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同一个部门(Dickens and Lang, 1992)。即在属于主要部门的垄断行业内部可能有人属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次要部门;而在竞争性行业中也可能有人属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主要部门。所以如果我们仅仅从某个行业、职业或者所有制出发,就不能全面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也不能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究竟多大这一问题做出准确地回答,自然更无法回答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收入分配有何影响。所以有必要采用综合上述所有信息,统一划分劳动力市场主要部门和次要部门的新方法来进一步对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如果在过去二十年不断增大的收入差距中,人口结构老化、城乡消费分布差异、全球化和劳动力市场分割都是重要原因的话,那么理解这些因素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这些机制的产生过程并对它们进行量化研究,无疑会增加我们对我国收入差距状况和成因的认识,并有可能对未来的收入差距做出一定的预测,并据此提出合理的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建议。

1.3 研究框架、概念和主要方法

如前所述,要想更好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就必须联系中国处于发展与转轨的双重转型进程中的大背景,以及政府的所执行的特殊的公共政策即城乡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地区差异性的对外开放

政策和严格限制性的人口发展政策等来考察收入分配状态的演变以及这些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为了能够更深入的讨论问题,所以本书在写作方式上,将尽量保证每一章主题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而并不过分苛求整体框架(见图1-1)的系统性。这样做的一个成本就是可能会使本书的主题略显杂乱,但收益也是相当明显的。正如在本书开头所强调的,每章的主题其实都是影响整个中国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格局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这些因素进行详尽的考察,只会进一步增加我们对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认识。这就像是在做一个拼图游戏,只有搞清楚每个细小问题的实际状况,最后才能将其完成为一幅精美的画卷^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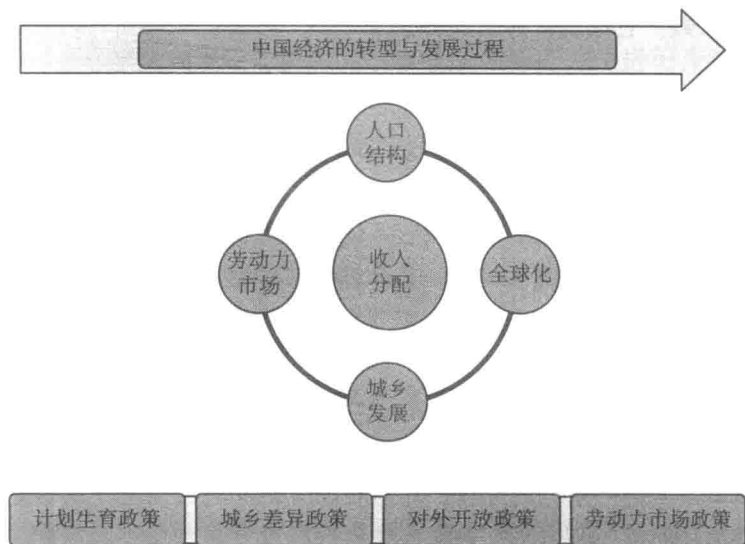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内容框架

本书研究的核心主题是中国收入分配演变和劳动力市场转型问题。从纯数学概念上讲,研究收入分配实质是研究收入变量的分布,以及通过某些分

^① 本书中除了第1章绪论和第8章结语之外的六章内容均可以单独成篇,而且具体在研究中由于采用的数据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在文献综述、数据介绍以及指标测量方面可能会略有重复。但为了保证每章的独立性,笔者没有进行修改。